

# 微觀教育場域與知識群體的形塑 ——兼論中共首批蒙古族黨、團員的誕生

齊 群

商務印書館  
北京大學歷史學系

**摘要** 本文以“土默特蒙古青年”為考察對象，討論了這個群體的形成背景、求學經歷以及身份認知的轉向。通過分析具體歷史情境下作為微觀教育場域的“北京蒙藏學校”，本文討論了土默特蒙古青年這一中小知識份子群體形塑和革命發生機制，認為教育經歷、文化氛圍、空間結構等場域內多重要素共同促成了這個群體的成長和革命轉向。

**關鍵詞** 土默特蒙古青年、北京蒙藏學校、場域、革命

二十世紀的中國最大主題也許就是“革命”<sup>1</sup>，那麼中國的革命何以在二十世紀上半葉接連發生？其原因和動力機制是什麼？回答上述問題，“知識份子”群體的作用是一個重要的切入點。此前，國內外中國革命史的研究大多集中於階級壓迫或中國革命共產主義與民族主義內在張力等問題。1967年，邁斯納（Maurice Jerome Meisner）以李大釗為研究中心，關注了中國知識份子接受馬克思主義的過程<sup>2</sup>，“知識份子”作為一個獨立的身份群體要素首次納入中國革命史的分析之中。史景遷（Jonathan D. Spence）擴展了“知識份子”群體的考察範圍，通過對康有為、魯迅和丁玲的人生歷程展現了近代知識份子愛內外危機下投身政治活動的思想糾葛<sup>3</sup>，將思想史和革命史的討論融為一體。

此後，知識份子與中國革命的議題從共產主義革命擴展到整個二十世紀上半葉的革命。羅志田從思想史的角度討論了新文化運動中，胡適代表的一代知識份子從“文化復興”走向“政治解決”的糾結轉變。<sup>4</sup> 陳永發則聚焦于五四之後知識份子的性格與其在法、俄思想主義選擇之間的關係，指出了激進主義與共產主義革命之間的思想關聯。<sup>5</sup> 王奇生從實證的角度指出中小知識份子為國民黨的重要組成部分，並相當程度上影響了國民黨的革命策略執行。<sup>6</sup> 石川禎浩則強調中國知識界在近代與日本的緊密關係，進而分析了馬克思主義從日本傳入中國及其與中國共產黨成立的關係。<sup>7</sup>

那麼，除了常論的思想和政治條件，知識份子在微觀層面又是在怎樣的心態和社會條件下轉向革命？其自身特質又給革命帶來了什麼樣的內容？王汎森以“煩悶”為切入，深入分析了新文化運動知識份子的個體心態，舊觀念破除帶來的生活秩序解體讓他們迫切需要新的倫理理念指導自己的行動，在此基礎上知識份子轉向“主義”並走上革命道路。<sup>8</sup> 應星則利用社會學“場域”的概念，從制度和精神兩個方面考察近代教育體制轉變，以及身在近代教育“場域”中不同層級的知識份子在轉變中形成的精神氣質，同時這些“場域”帶來的地緣、學緣和風氣也深深地影響了不同地域的革命形態。<sup>9</sup> 與之類似，孟慶延深通過描摹教育“場域”，考察了浙東學術傳統和浙江省立六師對於王觀瀾這一中小知識份子的形塑作用，進而分析了以之為代表的黨內技術幹部在土地革命中階級劃分的作用。<sup>10</sup>

“教育場域”帶來的制度、精神、地緣、學緣、思想風氣等諸多因素，突破了傳統思想史和政治分析路徑的單一，對於考察知識份子與近代革命的關係增益良多。那麼如何理解地緣、學緣、思想風氣等等因素在具體歷史情境下的相互碰撞以及對歷史行動者的影響？本文以中共首批蒙古族黨、團員為例，嘗試在更

微觀的層面考察教育場域對於知識份子的形塑，特別是考察這一群體如何走上革命道路。

中共首批蒙古族黨、團員是中共革命歷史上一個特殊現象：來自北京蒙藏學校的歸化城土默特蒙古青年學生在1923年至1925年集中走上了中共的革命道路，不但成為中共最早的少數民族黨、團員，也發展為內蒙古地區近現代歷史上一支重要的政治力量，這其中的卓越代表就是後任中華人民共和國副主席的烏蘭夫。北京蒙藏學校也因為培育了這一批革命青年而被稱為“內蒙古革命的搖籃”。<sup>11</sup>

對於這樣一個特殊的革命現象，本文關心的具體問題是：是哪些社會歷史因素促成了這個群體的產生？這個群體在北京蒙藏學校這個微觀的“教育場域”中又如何成長並集中走向中共的革命道路？

## 一 綏遠的“新文化”青年

1923年10月，李裕智、吉雅泰、孟純、烏蘭夫、佛鼎等歸化城土默特（今內蒙古呼和浩特與包頭地區）<sup>12</sup> 蒙古青年以官費身份來到北京蒙藏學校開始求學生活，甫一入校即遭遇校產變賣案和財政拮据、停止官費的飄搖窘境。在一系列的變故中，土默特學生並未如常人所想的那樣因身處塞北邊地而閉塞懵懂，相反，他們與校方、主管部門蒙藏院開展了激烈的鬥爭。鬥爭引起了校外各方社會勢力的關注，最終這群青年一起走上了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道路。

出身塞北邊地的歸化城土默特蒙古青年何以有如此強的覺醒意識，敢於同校方乃至蒙藏院開展鬥爭？他們在進入北京蒙藏學校之前是否已經形成了一個較為統一的精神氣質和思想文化心態？這就需要從綏遠的“新文化”運動講起。

儘管歸綏與北京相距不遠，但“新文化”和五四運動之風吹至綏遠要遲至1920年代。1921年7月京綏鐵路通車，綏遠始與內地有了更加緊密的經濟文化往來。此前，綏遠地區的文化氛圍仍然落後保守。當時歸綏城內只有一家書店，出售的新書還只是《官場現形記》《老殘遊記》《廿年目睹之怪現狀》之類的晚清官場小說，以及早期鴛鴦蝴蝶派駢賦體的《玉梨魂》《芸嵐日記》等。本地報紙只有老同盟會員王定祈創辦的《一報》（後改名為《西北實業報》）。中學教課雖然在學科上比較豐富，但國文史地仍然以文言文為主。<sup>13</sup>

將“新文化”思潮引入歸綏的是薩拉齊縣（今包頭市土默特右旗）人祁志厚。他於1916年自綏遠最高學府歸綏中學畢業後考入北京師範大學，1920年大學畢業即任歸綏中學校長。<sup>14</sup> 1921年3月，歸綏中學招收補習班一班（後改為中學第十一班），因是其任內招收的第一批學生，故祁志厚特別用心，專門請來北師的同學李廣和擔任該班國文教員。李廣和在國文課上不教授文言文，改教白話文，開始傳播“五四”運動的新文化、新思潮。這在學生中掀起了新文化的高潮。不久綏遠官方以“過激分子”的罪名將李廣和驅逐出境。<sup>15</sup>

這時，歸化城土默特蒙古學生李裕智、吉雅泰開始嶄露頭角，他們是歸綏中學十一班活躍學生的代表。他們倆在學生中比較年長（二人均為1901年出生，時年20歲，較同班同學年長2至3歲），與李廣和接觸較多，受影響較深。翌年春季開學後，十一班的學生以他們二人為中心，組織起讀書會，閱讀新書籍、新報刊。<sup>16</sup> 京綏線開通後，歸綏城的郵電事業發展起來，外地新報刊、書籍都能快速及時進入。歸綏中學的學生在1922年上半年就能夠閱讀到“高語罕的《白話書信》、亞東版汪原枚等人新式標點的有胡適序論的《紅樓夢》，上海益群書社重印合訂本《新青年》，上海《時事新報》、《民國時報》的副刊《學燈》、《覺

悟》和北京《晨報副刊》、胡適、康白情、俞平伯等人的白話詩集”<sup>17</sup>。同時他們還開始用白話文寫文章、寫信，遂導致與教授傳統文言的老師之間的矛盾。1922年上半年，歸綏中學學生們便驅逐了一位教古文的老學究。下半年，綏遠師範學校成立，歸綏中學十一班的吉雅泰、楊令德和董怡轉學報考，入學一周後便因校長、本地士紳榮祥在國文課上攻擊白話文而與之發生爭執，最後被開除出校。<sup>18</sup> 新文化運動在綏遠的傳播效果可見一斑。

京綏線的開通也推動了兩地文化交流，特別是在京綏遠人回鄉傳播。1922年上半年北京大學畢業的薩拉齊人白映星來十一班講課，介紹杜威、胡適以及五四運動後的情況。同時北大讀書的薩拉齊人陳志仁組織綏遠旅京同學會的同學暑假回來在歸綏公演話劇。<sup>19</sup> 陳志仁1919年考入北大中國文學系，他聯絡在京綏遠學生組織“綏遠旅京同學會”，為擴大影響，在京綏遠學生排演了《孔雀東南飛》《一元錢》《愛國賊》等“文明戲”（話劇）。1922年暑假，旅京綏遠學生到歸綏借用舊城“同和戲園”首演《孔雀東南飛》。<sup>20</sup> 公演前，劇團在歸綏中學排練，歸綏中學的師生也有參加演出。<sup>21</sup> 這拉近了綏遠青年學生的距離。在北京蒙藏學校讀書的歸化城土默特蒙古學生榮耀先、孟志忠作為綏遠旅京學生也參與到這次活動中，與在歸綏中學讀書的蒙古學生李裕智、吉雅泰緊密地聯繫起來。<sup>22</sup>

“五四”運動的“新文化”思潮在綏遠的傳播開放了學生思想，激發了學生的愛國熱情，紀念“五七”國恥、反對二十一條等活動在青年學生中具有相當的號召力。<sup>23</sup> 於是1923年5月7日發生了青年學生在“國恥”遊行中砸“盛記”洋行的事件。

事件導火索是日本拒絕中國政府取消二十一條，收回旅順、大連租借地的要求。3月25日、26日，滬、京學生相繼舉行示威遊行，抗議日本帝國主義行徑，在全國掀起抵制日貨的浪潮。<sup>24</sup> 此時歸綏城內中小學，已經多有成立學生自治會。1923年5月7日，

為索還旅、大，各校學生在歸綏中學集會，議決成立全區學生聯合會，並結隊遊行講演，路上學生勸導盛記貨莊老闆停售日貨遭拒。次日學生遂砸毀該貨莊。<sup>25</sup> 歸綏中學的李裕智、吉雅泰領導了這次運動：在中學校內，他們聯繫本班同學楊令德、武紹文，分頭串聯、鼓動本校同學上街宣講。<sup>26</sup> 對外校，他們聯絡土默特高小的蒙古族學生，雲澤（烏蘭夫）、奎璧、趙誠、多松年、雲潤等參與其中。在這次運動中，李裕智事前佈置，吉雅泰聯繫串聯，孟純在當天演講鼓動，土默特高小的蒙古族學生具體執行。<sup>27</sup>

經過此次運動，歸綏中小學中形成了一個“新文化”思想蒙古青年學生群體。在思想文化和精神氣質上，他們深受新文化影響，秉持樸素的愛國情感，富有行動力和組織力。1923年暑期，北京蒙藏學校重啟中學班招生，應屆政治經濟預科畢業生榮耀先承擔返鄉招生的任務，他聯係了此前熟悉的李裕智、吉雅泰、孟純等人，然後擴大到土默特高小的雲澤等人，說動土默特旗給予官費，由此開啟了土默特蒙古青年的北京求學之旅。<sup>28</sup>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地緣而非族群的因素才是綏遠地區“新文化”思想傳播的主軸，無論是祁志厚、李廣和還是白映星陳志仁，他們都是作為“綏遠人”從北京會想傳播新思想，而且他們與綏遠地方士紳、自治促進會會長李正樂關係緊密。<sup>29</sup> 因此在這個教育場域下，土默特蒙古青年實際上仍是綏遠地方文化群體的餘緒，“綏遠人”是他們基本的身份，族群因素只在行動組織、進京求學中起到群體內聚的連接作用。

## 二 走入“新學校”

1923年10月，土默特蒙古青年學生離開歸綏前往北京蒙藏學校求學，這群剛剛經歷過學文化運動洗禮的青年學生在北京蒙



藏學校並未順利地開始學業，而是開始了新一輪運動：兩次驅逐校長，為家鄉人請願，停發官費。這讓他們和蒙藏學校校方、蒙藏院官方產生了嚴重衝突。那麼以求學為目的的土默特蒙古青年為何在北京蒙藏學校捲入激烈的社會運動？本節從蒙藏學校的緣起、師生結構等方面分析原因。

北京蒙藏學校籌辦于民國元年（1912年）11月，為蒙藏事務局呈文合併前清咸安宮學、唐古忒學、托忒學及理藩部蒙古學而成。<sup>30</sup> 時任蒙藏事務局總裁的貢桑諾爾布本為清末內蒙古卓索圖盟喀喇沁右旗世襲紮薩克多羅都梭郡王，是少有的蒙古開明王公。他赴京到任蒙藏事務局總裁後即呈文建議建立新式蒙古學堂，在呈文中他寫道：“竊維蒙、藏、青海等處，交通不便，風氣閉塞，人民愚昧無知，不能順時勢謀進步。……今民國共和，首以發達民力為宗旨，參議院議決兩院選舉法五族一體，於立法機關既享平等之權，大總統優待蒙、藏一視同仁，于行政方針又持大同之旨。本局自當仰體鈞意，擁護共和，就前清咸安宮等三學及蒙古學基礎擴充改良，使蒙、藏、青海人民共受同等教育，開通其智識，促進其文化，俾能發揮其生產力，運用其選舉權，以副民國宗旨。”<sup>31</sup>

貢王呈請開設專門面向蒙藏邊疆地區的新式學堂，是因為他親歷清末國家危機以及由此產生的邊疆振興理想，為此建立的蒙藏學校也有他強烈的個人色彩。

首先，北京蒙藏學校是貢桑諾爾布個人在本旗辦學經驗的移植。北京蒙藏學校並不是貢王投入創辦的第一所學校，早在此前清末新政時期，他就在喀喇沁右旗試辦了崇正學堂、守正武學堂和毓正女學堂三所學堂。1902年10月31日，貢王在府內西院開辦崇正學堂，招收旗民的青少年及適齡兒童入學。然而本旗民眾一時對新學堂認識不足，又聽信謠言，貢王在第二年不得不以免稅除役來吸引本旗民眾將孩子送來上學。<sup>32</sup> 1903年貢王又趁日本

大阪第五回內國勸業博覽會之機，私訪日本，遊歷考察政治、教育、工業、軍備等情況。回國後貢王於7月設立守正武學堂，12月開辦毓正女子學堂，聘請日本軍教官和女教師。<sup>33</sup> 時值庚子之後日俄在中國東北爭奪勢力範圍，日本此時結交貢王無疑有背後的侵略目的，但另一方面來看，這些經歷也讓貢王深切體會到現代教育對於邊疆民眾的重要性。

其次，學校設立的目的是振興邊疆。貢王自己在清末民國政權嬗變之時也有過非分之想，此事被時任熱河都統熊希齡偵知上報袁世凱，袁世凱於1912年8月任命貢王為蒙藏事務局總裁，貢王9月9日赴京就職，並於10月晉封親王。<sup>34</sup> 袁世凱一方面用高官顯爵籠絡貢王，另一方面也讓他脫離本旗無法有行動力量，自此貢王逐漸安下心來，轉向邊疆人才培養。

貢王對北京蒙藏學校的影響並不僅僅體現在立校目的上，學校的管理層、教師群體以及招生，也都清晰地體現著他的影響。正是這些結構性要素，讓1920年代初的蒙藏學校矛盾四伏。

從學校的管理層來看，歷任校長都與貢王關係緊密。根據《北平蒙藏學校沿革志略》，自1913年開學到1924年，北京蒙藏學校的校長共有七位：達壽、張文、傅柏銳、張武、王維翰、金永昌、吳恩和。除張武、王維翰目前找不到個人經歷材料，其他五人均是貢王的舊交、屬下和本旗學生。

達壽校長是蒙藏學校第一任校長，也是北京政府時期北京蒙藏學校在職時間最長的校長（1914年–1922年）。達壽於1908年、1911年先後被任命為理藩部左侍和理藩部大臣，負責清廷蒙古政務。1909年9月，理藩部著手組織蒙藏地區資政院議員選舉事宜，召集在京蒙古王公進行商討<sup>35</sup>，此時達壽與在京陸軍貴胄學堂學習並御前行走的貢王相交。1910年5月貢桑諾爾布當選資政院外藩王公世爵議員，1911年10月後，達壽又短暫當選資政院副總裁。二人在這一時期接觸較多，關係日密，最終成為摯友。<sup>36</sup>



第二任校長張文，字獻廷，蒙名阿育勒烏貴，喀喇沁右旗五龍合村人，為貢王旗民。因熟悉司法案件而出任喀喇沁右旗駐熱河官員。1912年他隨貢王赴京，出任蒙藏事務局第四課課長、機要主任、參事、總務廳長以及國會議員等職。<sup>37</sup>他是貢王的親信，得以繼達壽之後出任校長。

接替張文擔任代理校長的是長期擔任蒙藏院第一司司長的傅柏銳<sup>38</sup>，此後1923年4月至11月任校長的張武身份不清，期間學校因師生衝突陷入混亂。貢王又先後任命京師員警廳司法處長王維翰<sup>39</sup>，貢王本旗崇正學堂培養出來的金永昌、吳恩和<sup>40</sup>為校長，整頓學校秩序。

學校的教師群體同樣與貢王有著密切的私人關係。以1920年學校中學班教師為例，概況如下：

表1 1920年北京蒙藏專門學校中學班教職工名單

姓名	籍貫	履歷	擔任職務/學科	通周授課時數	薪俸數目
劉重源	京兆三河	從北京求實中學來	歷史		每小時1.5元
張鳳翔	直隸灤河				同上
黃昌壽	安徽含山	從北京求實中學來	地理		同上
姚克恭	京兆固安				同上
蔡觀光	安徽懷寧				同上
巴彥泰	喀喇沁右旗		蒙語		同上
吳恩和	喀喇沁右旗		蒙語		同上
崇貴	滿洲鑲藍旗				同上
程樸洵	蒙古鑲白旗				同上
楊書升	直隸定縣				同上
盧之塏	直隸定縣				同上

資料來源：田琳、於·布仁巴雅爾：《中央民族大學附中校史》，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2008年，第70-71頁。

以上表中，劉重源畢業于清末增生八旗師範學校<sup>41</sup>，張鳳翔為宣統二年（1910年）會試一等，民國三年（1915年）任蒙藏院總裁秘書<sup>42</sup>，程朴洵曾留學日本<sup>43</sup>，崇貴肄業於清末宗室覺羅八旗右翼中學堂<sup>44</sup>，楊書升畢業于日本宏文學院<sup>45</sup>，巴彥泰、吳恩和來自喀喇沁右旗。可見蒙藏學校當時的教師主要分為三個來源：首先是于貢王有關係的內蒙古喀喇沁旗青年學生，大多是曾在旗內崇正學堂畢業，或在北京或在日本深造；第二部分是曾經科舉或在八旗學堂就讀的傳統文人，他們來此教書大多與達壽校長有關係；第三部分是有過留日經歷的知識份子。

那麼蒙藏學校的學生結構又如何呢？根據蒙藏學校的成績單，1922屆法律專科畢業生共12人，其中來自綏遠土默特旗的3人，喀喇沁地區的3人，京兆宛平縣的3人，內地、察哈爾和敖漢旗3人。1923屆政治經濟預科畢業生共31人，其中來自熱河喀喇沁地區（包括喀喇沁三旗和朝陽、建平、凌源、平泉等縣）達20人，占絕對多數；畢業生第二多的生源地就是綏遠土默特旗，有5人。其餘則來自熱河、遼寧、察哈爾等其他省分的蒙旗和直隸省各地。<sup>46</sup>

綜上，通過分析學校管理層、教師、學生的結構，我們可以看到：北京蒙藏學校在管理上由貢王及其親信把控；教師多為舊文人，且多與貢王有私人關係；學生主要來自以喀喇沁地區和綏遠土默特旗兩地，其中喀喇沁地區的學生佔據一定優勢。這就是1923年李裕智、吉雅泰、烏蘭夫等土默特蒙古青年入學時面對的學校環境：一個地緣上喀喇沁人占優，風氣上因循守舊的學校。

### 三 學政衝突與矛盾激化

深受“新文化”思想影響的綏遠土默特蒙古青年來帶北京蒙藏學校這個新的“微觀教育場域”後，未待求學生活開始，即遭遇嚴重的衝突危機。

根據烏蘭夫、奎璧等回憶，1923年秋入學後，一連串的事件將土默特蒙古青年捲入北京蒙藏學校校園風波中。“家鄉代表請願”——“停止官費”——“張武解職”——“驅逐校長”構成了一個因果系列事件<sup>47</sup>：1915年北京政府欲重新確權歸化城土默特蒙古人的戶口地以搜刮錢財，土默特蒙古人如不繳納高額地價就面臨土地喪失的危險，是為“乙卯大照”事件，歸化城土默特蒙古人推出代表連年向北京政府請願，這一年土默特蒙古青年學生恰逢在京便為之奔走卻沒有結果。北京政府解除同情學生的張武校長的職務，而土默特蒙古學生們相繼驅逐了兩任校長，這加深了他們對學校內部的階層矛盾和地域矛盾的認知。趁此時機李大釗派出鄧中夏、趙世炎、劉伯莊、韓麟符、李渤海等人進入蒙藏學校開展宣傳，土默特蒙古青年學生便在1923年冬天都加入到團組織中。

長期以來有關此段歷史的書寫大多基於上述回憶材料<sup>48</sup>，且時間多有錯亂，本節嘗試以多重史料互證，重新考察土默特蒙古青年到校以後的校園風波，進而重新理解他們의思想和認知轉變。

民國三年（1914年）綏遠當局發出佈告，要求土默特旗蒙古人限時贖回出租出典的“戶口地”，逾期不贖則令租種土地的民人交清押荒銀，換領執照，不得贖回。所換領的財政部地照按年歲被民間稱為“乙卯大照”，是為“乙卯大照”事件。<sup>49</sup>為了保住自己世代相襲賴以生存的“戶口地”，歸化城土默特蒙古人連年請願，而與土默特蒙古青年在京就學時間相符的一次是民國十三年（1924年）<sup>50</sup>，此時距離他們入學已經一年。因為請願而被停發官費更要遲至1924年11月<sup>51</sup>，因此土默特青年學生與校方和蒙藏院矛盾的起點並不是為家鄉請願而被停發官費。

實際上在1923年秋季，張武校長並不是被北京政府解職，而是因校產變賣案和學校經費拮据而主動辭職；驅逐校長事件也並不是“壓迫和反抗”的事件，而是教學矛盾引發的抗議。

儘管北京蒙藏學校在1923年暑期決定重開中學班招生，但是到秋季學校就陷入了嚴重的財政危機，校園房產也被人覬覦，土默特蒙古青年入京求學在一開始就不順利。1923年11月5日起連續三日，時任北京蒙藏學校校長的張武在《晨報》刊登聲明：“本校校舍雖系租借性質，但屬國立教育機關，茲聞所管機構已將校舍變賣，武對此事不能不有左之宣言：一，本校隸屬蒙藏院，非有院令絕不承認。二，即有院令非有相當永久校舍，寧可辭職絕不遷讓。（一、二兩條已於前月二十七日在校公佈矣）三，即有相當永久校舍，果本校經費問題不能相對的解決，寧可辭職絕不遷讓。”<sup>52</sup> 發佈宣言不久張武即辭職校長。<sup>53</sup>

所謂“校產變賣案”源于時任北京政府國會眾議院議長吳景濂的覬覦。蒙藏學校的校園西單石虎胡同8號租自財政部，被認為是吳三桂舊宅<sup>54</sup>，吳景濂自稱是吳三桂後代，有意要恢復祖產，故託名“吳益康”向財政部收買索要。當時房產估價8萬元，而財政部僅以1萬元售出，一時輿論沸騰批評財政部損害公產。這個案子一直拖到1923年12月，以吳景濂繳還執照告結。<sup>55</sup>

與此同時，北京教育界正經歷嚴重的財政危機。1923年9月，曹錕以“賄選”出任北京政府大總統，10月又匆忙通過《憲法》。為了慶祝這一“盛舉”，曹錕決定為欠薪已久的中央各部門注資。然而當時北京政府可支配的財政收入只有“鹽餘”（即當月鹽稅收入抵償外債後的餘款）一項，經過兩任財長東拼西湊，終於在11月湊足了300萬元，經閣議，中央各機關僅得當月應得經費之三成。<sup>56</sup> 這一財政危機一直延續到1924年2月春節，財政部沒有辦法給中央各部門撥發足額經費。<sup>57</sup>

北京蒙藏學校的上級部門蒙藏院自然也就只能獲得三成。按蒙藏院預算自民國八年（1919年）至十三年（1924年）約為140萬元上下，其中北京蒙藏學校的預算僅為3000元左右。<sup>58</sup> 蒙藏學校在蒙藏院經費中占比很小，極易被忽略，1923年秋季學期新招

中學班後，北京蒙藏學校旋因經費不足而不得不合班上課。<sup>59</sup> 因此，土默特蒙古青年回憶中的“北洋政府停止官費”，不過是蒙藏院和學校經費短缺的一種曲折表述。

本來懷著求學熱情來到北京的土默特蒙古青年，面對的卻是一個幾近斷炊、環境蕭索的學校，失望之情自然難掩。接下來校方的舉動進一步激化了矛盾。

1923年11月上旬，原京師員警廳司法處長王維翰接替張武出任校長，然而直到一個月後才在學校第一次露面，在對學校情況毫無瞭解的情況下立即要求教師出題測驗學生。教職員認為新班上課剛剛一個月，各科教授進度不多，還不適合開展測驗。此時王維翰和學生談話不合，遂離開學校。於是蒙藏學校全靠教師自覺上課維持，學生們倍感憤怒決議驅逐校長。王維翰在學校露面僅七天就掛職離去。<sup>60</sup> 接棒王維翰的是金永昌，他仍不能解決學生的經費問題，不得不在次年春辭職。

驅逐校長除了經費和學校教學問題以外，還有另外一層原因：守舊的校長禁止學生們參與社會活動。這與秉持“新文化”思想、積極參與社會活動的土默特蒙古青年的認知和行動不符。王維翰和金永昌都明令“禁止學生學生參加各種社會活動”“禁止罷課”“老實讀書”“不准聽信異黨分子的煽動，在校內外搗亂鬧事”。<sup>61</sup> 蒙藏院總裁貢桑諾爾布還專門給校長金永昌簽發訓令，批評該校學生“學風頹放”“遇事囂張”“沾染惡習”，命令金永昌在寒假期間改善學校管理辦法，在新學期按照新章程切實實行。<sup>62</sup> 可見，來自土默特青年學生與學校管理層和蒙藏院之間存在難以調和的矛盾。

那麼歸化城土默特蒙古青年學生來到北京半年不到，在尚未熟悉的情況下為什麼就與校方和蒙藏院產生了如此矛盾？本屬於校內的矛盾又與校外的“社會運動”和“異黨分子”有什麼關係，以至於兩任校長都強調不得參與其中？

## 四 學校場域與身份轉變

儘管土默特蒙古青年經歷了“新文化”思想的洗禮，但是李裕智、吉雅泰、烏蘭夫等一行四十人來到北京蒙藏學校時思想仍比較單純，“這是土默特旗蒙古人外出學習人數最多的一次，應該說這種舉動和我們當時的思想有直接的關係，……想出去學點東西，也想出去闖一闖，當然還談不上什麼革命。”<sup>63</sup> 既然思想單純、求學心切，為何貢王會專門怒斥這些學生“學風頹放、遇事囂張、沾染惡習”？除了爆發出來的校園事件外，日常生活裡土默特蒙古青年在北京蒙藏學校又有哪些不適？

作為土默特蒙古青年中年齡較長者，吉雅泰的回憶提供了線索：“那時，這個學校在封建軍閥王公把持下是十分腐敗落後的，提倡尊孔復古的封建思想和我們渴求解放的理想是格格不入的”；“那時學校辦的不好，被一些官僚掌握著，學生們特別厭惡學校，不想在那裡學習，而到北京師大一個補習班去學習”。<sup>64</sup> 為什麼吉雅泰會如此討厭蒙藏學校的學習氛圍？在什麼意義上學校的管理權被官僚把持？

如前所論，李裕智和吉雅泰都是歸綏中學“新文化”傳播的骨幹，也是土默特蒙古學生群體的交流中心。吉雅泰甚至曾因為古文與白話文的問題與他的校長、綏遠本地著名士紳、文人榮祥發生爭執，以至於被開除出校。<sup>65</sup> 而北京蒙藏學校的課程卻是以孔孟之道為主，這不能不讓李裕智、吉雅泰等發生內心的厭惡。北京蒙藏學校的教學內容源自貢王的教育理念：一方面，貢王自己的古文功底深厚，自幼受儒家傳統文化教育，另一方面，他和達壽校長延請的國文教師大多是舊式知識份子，故而北京蒙藏學校內的氛圍顯然並不開放，吉雅泰、李裕智對此有相當不滿。

這種厭惡也與學生個人狀況有關：相比于受新文化思想影響較深的李裕智、吉雅泰，年齡較小的烏蘭夫並沒有很強的不



適，他在歸綏時只上到高等小學，對蒙藏學校的課程並沒有很大抱怨：“學校開設的課程有：國文、蒙文、數學、歷史、地理、自然等。其重點仍然是灌輸孔孟之道，和普通中學沒有甚麼兩樣。我們對這個學習機會都很珍視，對每一門功課都是認真刻苦地學。”<sup>66</sup>

另外，學校管理層的身份也是引起土默特蒙古青年學生反感的因素。除了吉雅泰強調這所學校被軍閥官僚封建王公把持，烏蘭夫、佛鼎也認為，蒙藏學校不過是北洋軍閥政府開辦用來培養統治蒙古民族的工具的學校。<sup>67</sup> 這與學校管理者的身份關係密切。

在土默特蒙古青年此前的教育經歷中，學校的管理者一直是識知識份子。上文提到，1921年李裕智、吉雅泰、孟純入學時歸綏中學的校長是剛剛到任的北師大畢業生祁志厚；烏蘭夫、佛鼎、奎璧所在的土默特高等小學校的校長則是土默特旗本地的蒙古文人孫永貞。<sup>68</sup> 在綏遠和土默特旗重視教育的環境中，中小學校長均由本地知名文人或者本地在外學習歸來的知識份子擔任，與政治官僚差別很大。而土默特蒙古青年進入北京蒙藏學校後經歷的四任校長中，祇有張武曾留學德國，並獲得哲學博士學位，深受同學歡迎。<sup>69</sup> 連續被學生趕走的王維翰和金永昌都是普通官僚：王維翰來自京師員警廳；金永昌長期擔任國會議員。其後繼任的吳恩和，同樣和金永昌是貢王親信的學生，出身喀喇沁右旗，但長期在北京蒙藏學校任教，一直以教師身份出現在學生生活中，理解學生處境，對待學生較為溫和，故而學生們最後能夠接受他擔任校長。

蒙藏學校的招生結構和校園空間安排，進一步將土默特蒙古青年學生對授課風格和管理者身份的厭惡轉化為地緣性群體的身份認同。

1923年秋，榮耀先在土默特共招收39名蒙古青年來蒙藏學校上課<sup>70</sup>，同時入學的喀喇沁旗學生有20多人<sup>71</sup>，再加上當年暑期畢

業的政治經濟預科31人，總計學生近100人。這些來自內蒙古各地的蒙古族學生在生活空間上被按照地域劃分開來：“當時有個東大寢室和西大寢室，東大寢室住的是西部土旗蒙古人，西大寢室裡住的是東部喀喇沁旗蒙古人。”<sup>72</sup> 這進一步在學校的日常生活中明晰了喀喇沁青年和土默特青年之間的群體界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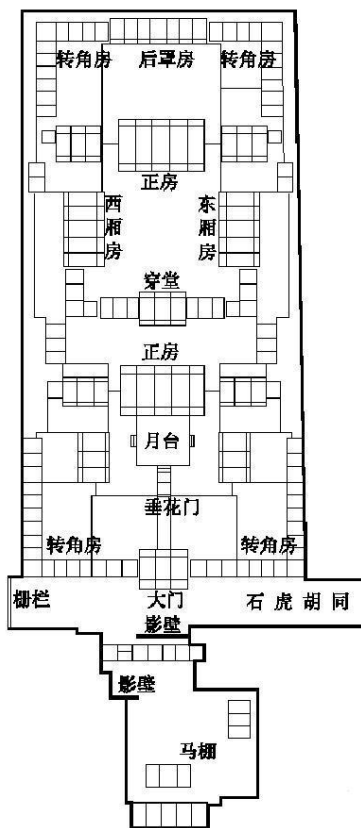


圖1 同治五年傅咸府邸畫樣，該院落即後來的北京蒙藏學校校址，在第二進院子裡的東西廂房各五間，即當時的東西大寢室。<sup>73</sup>

於是，土默特蒙古青年在蒙藏學校面對的是：來自喀喇沁的蒙藏院總裁貢王派駐了來自喀喇沁的校長，教授傳統知識的教師

來自喀喇沁，對面宿舍住的是來自喀喇沁的同學。在這樣的環境中面對學校發生的一系列風波，土默特蒙古青年的厭惡和不適逐漸發展成為對喀喇沁人的地域隔閡。

恰在此時，校外社會力量的介入讓這種隔閡轉化為學生們的政治選擇和身份認同。

土默特蒙古青年入學後，便引起了北京城各政治派別的注意，諸多政治要人紛紛來校宣傳演講：“我們去了以後，社會上各政黨、各政治派別的注意力，便集中在我們這一批蒙古族知識份子身上。國民黨、社會民主黨、無政府主義黨以及其他派別，都到蒙藏學校活動過，江亢虎、吳稚暉都去發表演說”；“蒙藏學校當時在政治上是比較活躍的地方。記得當時有個丁維汾，雲佳惠（即雲恒）[筆者注：當為雲嘉惠，即雲亨]到蒙藏學校活動，他是老同盟會員，認識孫中山。”<sup>74</sup> 可見當時北京蒙藏學校當時熱鬧的氛圍。

蒙藏學校翻湧的校園事件也引起了中共黨組織的注意。來自熱河建平縣的韓麟符此時參加了李大釗組織的北京大學馬克思學說研究會，他是天津團組織的創建者之一，因其來自內蒙古地區，熟悉內蒙古情況而被派往北京蒙藏學校拓展組織。在學校韓麟符通過同為熱河人的張良翰結識了李裕智、吉雅泰等人，遂在土默特蒙古青年中宣傳中共的方針政策。<sup>75</sup>

土默特蒙古青年受“新文化”思想的影響，又在學校面臨來自校方的壓力和守舊的學風，很容易就被韓麟符的宣傳吸引，進而轉向中共黨、團組織。孟純回憶道，當時住在東寢室的土默特蒙古青年四十人，除兩個人以外都加入了中共黨、團組織，以至於蒙藏學校的組織會議召開會議十分方便，只要有人在門口放哨，屋裡就能開會。<sup>76</sup> 這種空間場域進一步加深了土默特學生基於地域的政治身份認同，從而成為一個高度凝聚的集體。

到1924年7月，這一批土默特蒙古青年學生已經全部被接納為共青團員。<sup>77</sup> 從此走上了中國共產黨的革命道路。

## 五 小結

正如王奇生指出的，中國近代的國民革命和共產主義革命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小知識份子主導的。然而不同于大知識份子擁有的突出歷史地位，中小知識份子很難用思想史的方式來研究。如何探索中小知識份子在具體的歷史進程中的思想轉變、革命選擇？應星有關“新教育場域”的研究提供了一條新的路徑。

本文同樣從“教育場域”的概念出發，嘗試從微觀層面上討論“土默特蒙古青年”這個群體的群體邊界形成、思想底色、精神氣質以及身份認知和革命轉向。

本文的討論表明，綏遠地區的“新文化”思想傳播和北京蒙藏學校共通形塑了土默特蒙古青年學生群體：“新文化”思想的傳播構建了土默特青年的思想底色，愛國運動加深了他們作為共同體的聯係。蒙藏學校的管理制度、授課傾向、學風氛圍以及校園風波引發了土默特青年群體的抵觸，這種抵觸進一步通過學校的學生地域結構和空間生活安排加深為基於地域的群體身份認同。恰在此時，中共進入蒙藏學校開展宣傳，傳播新思想，號召反對壓迫，引發土默特青年的共鳴，進而讓他們一同走上中共的革命道路。

微觀層面的考察表明，群體的革命發生機制並不能用單一因素解釋，相反一個群體從形成到走上革命道路需要一個歷史過程，在這個過程中諸多社會要素不斷彙聚。群體中的每個人都是在社會要素和關係網絡之中成長的。因此“場域”概念更適合用於解釋群體形成和認知轉向的歷史過程。

北京蒙藏學校正是一個這樣的微觀教育場域：保守的管理，傳統的教學，按照地域劃分的生活空間，思想開放的新學生，偶發的校產變賣案和經費短缺，外部社會力量的加入，所有這些要素都彙聚在北京蒙藏學校，催生出走向中共革命道路的土默特青年學生群體。

因此，知識份子與中國近代革命的聯繫並非簡單的思想關聯，還有地緣、身份群體、空間和偶發事件等諸多要素，這些要素發揮的作用也並非一成不變，而是要看具體的場域組合。

## 注釋

- 1 王奇生：〈高山滾石：20世紀中國革命的連續與遞進〉，《華中師範大學學報（人文社會科學版）》第5期（2013），96-106。
- 2 [美]莫里斯·邁斯納：《李大釗與中國馬克思主義的起源》，中共北京市委黨史研究室編譯組譯（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
- 3 [美]史景遷：《天安門：知識份子與中國革命》，尹慶軍等譯（北京：中央編譯出版社，1998）。
- 4 羅志田：〈走向“政治解決”的“中國文藝復興”——五四前後思想文化運動與政治運動的關係〉，《近代史研究》第4期（1996），120-152。
- 5 陳永發：《中國共產革命七十年》（上）（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1998），47-114。
- 6 王奇生：《黨員、黨權與黨爭：1924-1949年中國國民黨的組織形態》（上海：上海書店出版社，2003），27-39、260-266。
- 7 [日]石川禎浩：《中國共產黨成歷史》，袁廣泉譯（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6），1-53。
- 8 王汎森：〈“煩悶”的本質是什麼——近代中國私人領域與“主義”的崛起〉，載于氏著：《思想是生活的一種方式——中國近代思想史的再思考》（臺北：聯經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2017），113-164。
- 9 應星：《新教育場域的興起：1898-1926》（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2017）。
- 10 孟慶延：〈“讀活的書”與“算死的賬”：論共產黨土地革命中的“算帳派”〉，《社會》第4期（2016），40-75。
- 11 郝維民主編，甘旭嵐等著：《內蒙古革命史》（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7），80。
- 12 清代歸化城土默特左右兩翼蒙古不設紮薩克旗，統歸歸化城副都統管轄，歸化城副都統受綏遠城將軍管轄。歸化城與綏遠城相距二里，為今呼和浩特市區。雍正後漢族移民漸多，設廳撫民，位於歸化城土默特的有：歸化廳、薩拉齊廳、托克托廳、和林格爾廳、清水河廳、武川廳，受歸綏分巡兵備道統轄，歸綏道隸屬山西巡撫。故此地可稱“歸綏地區”。民國元年（1912年）歸綏道改為歸綏觀察使公署，仍

隸山西省；民國二年（1913年）改歸綏觀察使公署為歸綏道尹公署；民國三年（1914年），“晉綏分治”，成立綏遠特別區域，轄綏遠道、烏蘭察布盟、伊克昭盟、土默特總管旗，原歸綏道尹改設綏遠道尹。至此綏遠特別區成立，國民政府後改綏遠省。因清末及民國此地以漢人居多，外出均以“綏遠”自居，故本文以“綏遠地區”稱呼此地，以“歸化城土默特”稱呼綏遠道、土默特旗蒙古人；但在援引材料均按原文，不強求統一，亦用“歸綏地區”、“（歸化城）土默特地區”兩個稱謂。

- 13 楊令德：〈魯迅著作初期在我區西部的傳播〉，載于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文史資料委員會編：《內蒙古文史資料》（第30輯）（1988），14。
- 14 “祁志厚”，徐有春編：《民國人物大辭典》（上）（石家莊：河北人民出版社，2007），408。
- 15 《綏遠通志稿·卷四十二（上）·學校》，綏遠通志館編：《綏遠通志稿》（第6冊，卷41-49）（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69；楊令德〈五四初期新文化運動在綏遠地區的傳播〉，《內蒙古文史資料》（第14輯）（1984），198-199。
- 16 楊令德：〈五四初期新文化運動在綏遠地區的傳播〉，《內蒙古文史資料》（第14輯）（1984），199。
- 17 楊令德：〈塞上憶往——五四運動新文化新思潮的傳播〉，《內蒙古文史資料》（第16輯）（1985），171。
- 18 楊令德：〈五四初期新文化運動在綏遠地區的傳播〉，《內蒙古文史資料》（第14輯）（1984），199；楊令德：〈塞上憶往——五四運動新文化新思潮的傳播〉，《內蒙古文史資料》（第16輯）（1985），172-173。
- 19 楊令德：〈塞上憶往——五四運動新文化新思潮的傳播〉，《內蒙古文史資料》（第16輯）（1985），171。
- 20 陳夢貞：〈陳志仁與綏遠新文化運動〉，孔慶臻、耿鴻鈞、李吉吾主編：《朔漠前塵》（呼和浩特：內蒙古自治區文史研究館，2005），94。
- 21 楊令德：〈塞上憶往——五四運動新文化新思潮的傳播〉，《內蒙古文史資料》（第16輯）（1985），171。
- 22 榮光請、榮春梅、榮光正、榮光裕：〈榮耀先傳略〉，土默特志編纂委員會：《土默特史料》（第四集）（1982），10。
- 23 楊令德：〈塞上憶往——五四運動新文化新思潮的傳播〉，《內蒙古文史資料》（第16輯）（1985），172；烏蘭夫革命史料編研室編：《烏蘭夫回憶錄》（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30-31。



- 24 郭廷以：《中華民國史事日志》（第一冊，民國元年至民國十四年（1912-1925））（臺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79），710-712。
- 25 《綏遠通志稿·卷六十三·政黨法團》，《綏遠通志稿》（第八冊，卷61至卷64）（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719。
- 26 楊令德：〈塞上憶往——五四運動新文化新思潮的傳播〉，《內蒙古文史資料》（第16輯）（1985），172。
- 27 烏蘭夫革命史料編研室編：《烏蘭夫回憶錄》（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34-37。
- 28 榮光清等：〈榮耀先傳略〉，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志編纂委員會編：《土默特史料》（第4輯）（1982），17。張蘭田：〈在蒙藏學校的日子裡（摘錄）〉，中共河北省黨史研究室編：《黨史人物》（二）（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137-138。烏蘭夫革命史料編研室編：《烏蘭夫回憶錄》（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40-42。
- 29 “李正樂不僅是前清的秀才和民國的山西省議會議員，而且是歸綏中學甲班的‘老大哥’，擔任過王定圻《一報》社的社長，為人比較正派，在他們的小圈子中很有威信。科室他所能號召的不過是畢克齊的趙允義（字宜齋，歸綏中學校長）、察素齊的潘秀仁（字箴四，歸綏中學學監）、托縣的閻肅和黨部的兩個子明，薩拉齊的陳志仁（字子的）、白映星（字鏡潭）與五原辛崇業（字級三）三個北大大學生，以及安玉山、亢仁山、李玉山、劉集三、高象山，所謂歸綏縣五大名山而已。”老槍：〈孤魂灘事件始末〉，中共呼和浩特市黨史資料徵集辦公室、呼和浩特市地方志編修辦公室：《呼和浩特史料》（第五集）（1984），114-115。
- 30 關於蒙藏學校的源流與籌建，因文獻缺乏，傳抄錯誤，模糊不清。相關史實澄清，參見張建軍：〈民國時期北京蒙藏學校緣起再考察〉，《民國檔案》第1期（2015），95-107。
- 31 〈蒙藏學（事）務局呈大總統酌擬合併咸安宮學、唐古忒學、托忒學等三學及前理藩部之蒙古學擴充改良改名蒙藏學堂請鑒（附章程）〉，璩鑫圭、唐良炎：《中國近代教育史資料彙編·學制演變》（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1），603-604。
- 32 〈貢桑諾爾布傳〉（訥古單夫譯自內蒙古社會科學院藏《世界名人傳》第三冊），《內蒙古文史資料》（第32輯）（1988），19。賈蔭生整理：〈崇正學堂〉，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赤峰市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赤峰市文史資料選輯》（第4輯）（1986），62。〈浙江分

巡道為駐滬日本領事函送大阪勸業博覽會章程並提供物品事移文・附件二・農商部第一百三十九號告示），王海青編：〈晚清中國參加日本大阪第五屆勸業博覽會史料〉，《歷史檔案》第4期（2005），17。

- 33 賈蔭生：〈貢桑諾爾布大事紀年〉，《赤峰市文史資料選輯》（第4輯）（1986），43。

按：貢王赴日本的緣起、經過和回國後建立武、女兩學堂的經過不同史料有不同記載。吳恩和、邢複禮認為，貢王是在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冬季受日本駐華公使內田康哉介紹與祺承武、憲章等帶僕人秘密赴日，參觀神戶（應為大阪，二者距離較近）博覽會。光緒三十年（1904年）冬分別開設了毓正女學堂和守正武學堂。《世界名人傳》則記載貢王是通過他的日本友人陸軍少將中村愛三和日本駐北京大使陸軍少將山根武亮（此處有誤，應為日本駐華公使館武官）向日本政府提出提出計畫，得到日本政府批准後於光緒二十九年（1903年）五月秘密東渡，受到日本首相大隈伯爵和內閣成員接待，並參觀各大都市。六月回京，七月回旗，十二月開辦毓正學堂，次年秋九月開辦守正學堂。汪宗一則回憶道毓正女學堂是1904年夏季開辦的，同年冬開辦守正武學堂。參見吳恩和、邢複禮：〈喀喇沁親王貢桑諾爾布〉，《內蒙古文史資料》（第32輯）（1988），5；〈貢桑諾爾布傳〉，《內蒙古文史資料》（第32輯）（1988），20-21；汪宗一：〈崇正學堂〉，政協喀喇沁旗委員會文史資料工作委員會編：《喀喇沁旗文史資料》（第一輯）（1984），87-88。

本文採用賈蔭生和《喀喇沁旗志》整理後的觀點。參見賈蔭生：〈貢桑諾爾布大事紀年〉、〈崇正學堂〉，《赤峰市文史資料選輯》（第4輯）（1986），43-44、62-63；《喀喇沁旗志·卷三十·教育》，喀喇沁旗志編纂委員會編：《喀喇沁旗志》（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952-958。

- 34 吳恩和、邢複禮：〈喀喇沁親王貢桑諾爾布〉，《內蒙古文史資料》（第32輯）（1988），13；賈蔭生：〈貢桑諾爾布大事紀年〉，《赤峰市文史資料選輯》（第4輯）（1986），47-48。關於袁世凱任命貢王為蒙藏事務局總裁的時間，不同記載略有出入，賈蔭生的貢王大事紀年記為八月，而孫宏年在《中華民國人物傳·姚錫光》中寫到，9月9日，貢王才被任命為總裁，16日到任，農曆時間分別為七月廿八日與八月初六日。
- 35 1909年10月底，部分年班晉京蒙古王公錄續抵達京城，憲政編查館知照理藩部：“俟十二月內各該王公到齊後，定期約集部署，會議創設蒙地議事會一切辦法，以便決定實行。”〈商設蒙地議事會〉，《大

- 公報》1909年10月30日第2張，轉引自張建軍：《清末民初蒙古議員及其活動研究》。
- 36 楊進銓：〈關於〈民族詞典〉有關蒙藏學校詞目釋文的商榷〉，《民族教育研究》第2期（1992），81-84、87。
- 37 高岳宇主編、徐世明副主編：《赤峰人物·總近現代卷》（北京：中國文史出版社，2002），239-240。
- 38 白尚勤：〈蒙藏委員會的歷史沿革和組織概況〉，內蒙古自治區文史研究館編：《內蒙古文史資料選輯》（第4輯）（內蒙古文史研究館，1996），3；東方雜誌社：《近代中國史料叢刊編輯·860·民國職官表》（臺灣：文海出版社），478。傅自1916年起擔任第一司司長，直到1924年3月被免職。參見〈平政院裁決書〉，《法律週刊》第34期（1924），18。
- 39 〈警廳處長被控拘押〉，《晨報》，1920年12月29日第六版；張蘭田：〈在蒙藏學校的日子裏〉，中共河北省黨史研究室編：《黨史人物》（二）（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138；郝維民、金海：〈烏蘭夫年譜〉史料訂正劄記，金海主編：《近代蒙古歷史文化研究》（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9），51-52。
- 40 吳恩和、邢複禮：〈喀喇沁親王貢桑諾爾布〉，《內蒙古文史資料》（第32輯）（1988），5、7、12；吳恩和：〈辛亥革命時期回憶錄〉，中國人民政治協商會議內蒙古自治區委員會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編：《內蒙古辛亥革命史料》（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0），87、89；[日]野津彰：〈內蒙古赤化運動的變遷〉，《內蒙古近代史譯叢》（第1輯）（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166。
- 41 《河北三河新志·文獻志·選舉篇》，《河北三河新志》（第十卷）。
- 42 楊樹人：〈教育世家張鳳翔先生〉，灤南縣民間文學三套集成辦公室編：《灤南人物故事》（1986）。
- 43 梁實秋：《秋室雜憶》（北京：中國工人出版社，2012），10。
- 44 〈宗室覺羅八旗右翼中學堂關於開除學生給八旗學務處的呈〉，北京市檔案館編：《北京檔案史料》（2000，四）（北京：新華出版社，2000），53。
- 45 朱有瓚：《中國近代學制史料》（第三輯，上冊）（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1990），432。
- 46 《蒙藏院諮送蒙藏學校法律專科畢業生成績表備案由，附件一》，1922年6月26日；《蒙藏院諮送蒙藏專校政治經濟預科畢業生一覽表由，附表一》1925年6月15日；臺北：國史館館藏檔案，019000000776A。

- 47 烏蘭夫革命史料編研室：《烏蘭夫回憶錄》（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45-50；奎璧：〈沿著黨指示的方向走〉，《土默特史料》（第四輯）（1982），78-79；佛鼎：〈打開心扉的金鑰匙〉，《土默特史料》（第四輯），119-121。
- 48 郝維民主編，甘旭嵐等著：《內蒙古革命史》（呼和浩特：內蒙古大學出版社，1997），80-85。朱文通主編：《李大釗年譜長編》（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9），406。
- 49 土默特左旗《土默特志》編纂委員會編：《土默特志·土地與墾殖志》，《土默特志》（上）（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205-206。
- 50 〈土默特公民代表為請示遵活約地應否回贖並停發部照的呈文〉，陳志明編：《土默特歷史檔案集粹》（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2007），147-148。
- 51 劉伯莊：〈北京地方報告第一號——北京地方團改組大會情況報告〉，1924年12月7日，中央檔案館：北京市檔案編：《北京革命歷史檔案集（1922-1926）》（1991），164。
- 52 張武：〈宣言〉，《晨報》，1923年11月5日第一版。
- 53 〈蒙藏學校又鬧風潮〉，《晨報》1923年12月12日第六版。
- 54 然而根據蒙藏學校當時的檔案，這座院落被稱為“毓公府”，最早可上溯至乾隆四十四年前大學士馬齊之子傅良，乾隆四十四年內務府轉授給乾隆長孫綿德，此後一直延續下來，故此院是否是吳三桂舊宅仍需考訂。但在土默特青年入學時榮耀先也向他們介紹這是吳三桂的舊王府，可見當時的人普遍接受這一觀點。參見田琳、於·布仁巴雅爾：《中央民族大學附中校史》（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2008），9-10；烏蘭夫革命史料編研室編：《烏蘭夫回憶錄》（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44。
- 55 〈財部科長盜發執照，拍賣蒙藏學校黑幕暴露〉，《晨報》1923年11月18日第二版；〈財部盜發執照案重大〉，《晨報》1923年11月20日第三版；〈管聯第尚在財部，吳益康將交還執照〉，《晨報》1923年11月21日；〈吳景濂不肯繳還執照，結果須送交法庭審訊〉，《晨報》1923年11月22日第二版；〈吳景濂不肯繳照，王克敏手段大軟〉，《晨報》1923年11月24日第二版；〈吳景濂允繳還執照〉，《晨報》1923年12月13日第三版；〈吳景濂繳還執照〉，《晨報》1923年12月15日第三版。
- 56 〈山窮水盡之財政，本月收入只賴鹽餘，扣抵外債僅余六十萬〉，《晨報》1923年11月8日第二版；〈本月收入只有一百五十萬元〉，《晨報》1923年11月9日第二版；〈三百萬元之分配，昨日特別閣議決定〉，

- 《晨報》1923年11月17日第二版；〈三百萬元分配變更〉，《晨報》1923年11月18日第二版。
- 57 〈上海晚報：北京之一片呼窮聲〉（北洋政府京畿衛戍司令部檔案），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三輯，財政（一））（南京：鳳凰出版社，1991），208。
- 58 〈財政部編：1916年度國家歲入歲出預算表〉、〈財政部編：1919年度國家歲入歲出預算表〉、〈財政整理會試擬1924年度中央暨各省區國家歲入歲出預算表〉，中國第二歷史檔案館編：《中華民國史檔案資料彙編》（第三輯，財政（一））（南京：鳳凰出版社，1991），536-538、711、762。田琳、於·布仁巴雅爾：《中央民族大學附中校史》（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2008），13。
- 59 姚克恭：〈北平蒙藏學校沿革志略〉，田琳、於·布仁巴雅爾：《中央民族大學附中校史》（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2008），73。
- 60 〈蒙藏學校又鬧風潮，驅校長〉，《晨報》1923年12月12日第六版。姚克恭：〈北平蒙藏學校沿革志略〉，田琳、於·布仁巴雅爾：《中央民族大學附中校史》（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2008），73。
- 61 烏蘭夫革命史料編研室編：《烏蘭夫回憶錄》（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48-49。
- 62 〈蒙藏院訓令第三號〉，《政府公報》1924年2月5日第2830號，5。
- 63 佛鼎：〈內蒙古革命的發生、發展簡況〉，人民出版社編：《革命回憶錄》（8）（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20。
- 64 吉雅泰：〈李大釗與內蒙古早期革命活動〉，《回憶李大釗》（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168；〈內蒙古革命史上的幾個問題〉，《黨史研究資料》（第4集），19。
- 65 楊令德：〈五四出席新文化運動在綏遠地區的傳播〉，《內蒙古文史資料》（第14輯）（1984），199；〈塞上憶往——五四運動新文化新思潮的傳播〉，《內蒙古文史資料》（第16輯）（1985），172-173。
- 66 烏蘭夫革命史料編研室編：《烏蘭夫回憶錄》（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44。
- 67 佛鼎：〈內蒙古革命的發生、發展簡況〉，《革命回憶錄》（8）（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20；烏蘭夫革命史料編研室編：《烏蘭夫回憶錄》（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45。
- 68 《土默特志·教育志·學校》，《土默特志》（上）（呼和浩特：內蒙古人民出版社，1997），780；雲素珍、榮竹林：〈土默特學校〉，呼和浩特市政協文史和學習委員會、內蒙古土默特文化研究會編：《呼和浩特文史資料》（第15輯）（呼和浩特：遠方出版社，2004），88。

- 
- 69 康濟民：〈蒙藏學校革命活動點滴〉，《內蒙古青運史研究》第1期（1985），33。
- 70 田琳、於·布仁巴雅爾：《中央民族大學附中校史》（北京：北京教育出版社，2008），17。
- 71 烏力吉敖喜爾：〈在北京蒙藏學校〉，《內蒙古青運史研究》第1期（1985），30。
- 72 康濟民：〈蒙藏學校革命活動點滴〉，《內蒙古青運史研究》第1期（1985），33。
- 73 胡燕、潘明率：〈國立蒙藏學校舊址歷史研究〉，《古建園林技術》第2期（2011），44-46。
- 74 佛鼎：〈內蒙古革命的發生、發展簡況〉，《革命回憶錄》（8）（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120；烏蘭夫革命史料編研室編：《烏蘭夫回憶錄》（北京：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1989），45；康濟民：〈蒙藏學校革命活動點滴〉，《內蒙古青運史研究》第1期（1985），33。
- 75 羅章龍：〈羅章龍談韓麟符〉，中共河北省黨史研究室編：《黨史人物》（二）（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129。
- 76 孟純：〈大革命時期內蒙古地區的革命活動〉，內蒙古自治區檔案館編：《內蒙古民族團結革命史料選編》（1983），25。張蘭田：〈在蒙藏學校的日子裡〉，中共河北省黨史研究室編：《黨史人物》（二）（北京：中共黨史出版社，1997），138。
- 77 〈日葵給中英信——團北京地委改組肅清內部等情況報告〉，1924年7月10日，中央檔案館、北京市檔案編：《北京革命歷史檔案集（1922-1926）》（1991），111。